

「1960年代的臺灣」學術研討會會議報導

任育德 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研究典藏組副研究員

此研討會由文化部所屬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主辦，中國近代史學會協辦，2016年11月12日於中正紀念堂中正演藝廳舉行，會中分就臺灣在1960年代的外交、內政、經濟、文化等議題方向發表11篇論文。

陳立文〈1950、60年代蔣中正保臺、反攻與聯美的三角形戰鬥策略〉，從「蔣中正日記」有關保臺、反攻、聯美概念組成「三角型戰鬥群」戰術構想，提出戰鬥群觀念建立及發展、運作，到1960年代已處於靜中求動的狀態，發揮在嘗試自製武器、農技團援外等面向，以「國光計畫」為機動、主攻的犄角。評論人吳淑鳳提醒，該文過度仰賴單方資料，可能忽視現實問題而失去批判性的問題。楊善堯〈最後的反攻軍事設計：蔣中正與光復大陸設計研究委員會〉關注光復大陸委員會的「智庫」功能，指出政府在較為急迫的軍事行動外，嘗試著眼未來「預期可能」發生情形研擬方案，以期有朝一日派上用場。主政者深知建設臺灣是反攻計畫成功的要件之一，因此該會研擬方案也有成為行政部門在臺灣施政參考方案者。評論人楊維真指出智庫成員的組成背景、單位組成原因及委員會討論內容歸類分析，亦是研究者不可忽略的探討部分。

陳英杰〈臺灣的軍眷住宅——以蔣中正與宋美齡為中心的探討〉一文，以婦聯會在1956到1967年間主持興建的十期軍眷住宅為探討對象，注意到領導當局面對來臺軍

士成家安家的現實，指出軍眷住宅從克難式建物到相對整齊、有水電交通規劃的集居式眷宅，也是社會從「一切從簡，方便撤遷」轉型到「安居樂業，落地生根」的象徵。眷村區位在戰略考量下，集中在都會外圍，但面臨防洪設施尚未完備的現實，也會在颱風豪雨時遭到損失。人力的轉移投入生產，則適時成為臺灣經濟成長的動力之一。侯嘉星〈國土開發與環境利用——以1960年代退輔會高山農場之設置經營為例〉指出，在決策者眼中，高山農場肩負國土開發、環境利用二重意義，這一觀念也使得高山農場在1990年代後轉型為休閒觀光農場，成為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的重要資產。1960年代屬於開發階段，主事者尚在摸索經營方式，成功栽培溫帶果樹，使此經驗也成為國內外仿效對象，帶動山區開墾。但也必須正視在水土保持、森林火災、水資源污染問題上的侷限。評論人洪紹洋建議，在軍方眷舍之外，或可參考國民住宅建設計畫。進一步比較兩種系統的住宅區的籌建過程，進行更寬廣的住宅政策歷史分析。他也肯定研究早期臺灣經濟時，關注環境問題有其必要，此外關注退輔會的榮民與當地民眾的經濟和社會交流狀況、種植作物對當地生態造成的改變，也是未來進一步探索時可延伸的思考面向。

李君山〈政府遷臺後「戶警合一」之實施（1952-1992）〉思考戶警關係的歷史源流，指出戶警關係在歷史上是先有警後有

戶，且警政高於戶政，需待民權觀念普及、警察權力角色受到限縮後，戶政地位方告提升。日治時期的人口控制營造的基礎和南京國民政府實施戶籍法，締造戰後臺灣的現代戶政，是歷史的巧合，也是「Y型源流」架構的具體展現。決策者的實施意志堅定，和行政體系的態度保留恰成對照，決策過程呈現上下、戶警、文武、軍民緊張的關係。評論人楊維真表示，戰後臺灣歷史在軍事化環境中，所具有的多元面向，值得學界投注更多的關注。許峰源〈故宮文物赴美國展覽與蔣中正的文化外交〉注意1960年代故宮文物到美國五大城市、紐約世界博覽會展示，一方面展示臺灣經濟發展、地方風情，藉以擴展對外貿易及推銷觀光產業，也藉此宣示政府傳承中國正統地位，以穩固臺美關係，爭取美國支持之意。評論人任天豪指出，針對政府文化外交的意識、作為外交戰略的環節之一可再行深入探究。蘇聖雄〈蔣中正與陳誠之關係（1958-1965）〉利用日記，分析1958到1965年間蔣介石與陳誠關係，指出陳誠個人健康因素，實為觀察蔣陳互動時必須考慮進去的因素。雙方確有其革命感情存在。評論人李君山再度提醒私人日記未必悉數私人之間的矛盾和鬥爭，僅依據日記立論實有其侷限性，仍需參考它種資料和前人研究。

皮國立〈1960年代蔣介石與臺灣「現代國民」的身體治理與教育〉關注1960年代的身體、精神、文化生活，注意到中層行

政官員透過各類運動的發動及實施，以對人民日常生活進行行為矯正。在建構現代國家、國民身體同時，也藉由整理及重訂禮儀以強化中國正統與道統代表的思維。鄭巧君〈1960年代國際宣傳裡的蔣中正形象〉討論1960年代政府國際宣傳機構、觀光事業機構在國家元首形象塑造，仍以軍事為主要攻防點，但在平面宣傳照考量閱讀者為一般大眾，刻意呈現家庭生活等軟性形象。評論人王良卿指出，1960年代確實有其特殊性，同樣一個身體動員的主題還具有多樣性的表現：道德化的、泛道德、去道德化的，國家的影子總藏在其中。同時也敏銳提問，1960年代蔣介石的公共形象塑造，在政府打造的目標與國際社會認知之間的歧異，以及政府又該如何回應，其間的操作手法值得再行探究。

張世瑛〈蔣中正與遷臺後國防最高決策機制的運作：以總統府軍事會談為中心〉一文，透過國史館兩蔣檔案的總統府軍事會談記錄、陳誠副總統文物等史料，指出蔣介石在1949年後的檢討顯示他在軍令領導上具有絕對信心，遷臺後在軍事上也採取偏向私人化的用人模式。總統府軍事會談是蔣重建國防決策組織的重要拼圖，會中絕大多數決策性討論事項都與美國建議息息相關，蔣中正正在會中決策也在滿足美方要求之餘，維持己方底線，展現臺灣社會軍事化的現象。黃克武〈蔣中正、陳誠與知識分子的互動：以1950年代末至1960年代初「三連任」問題

為中心〉，探討以總統「三連任」為個案探討蔣介石、陳誠與胡適等知識分子三方互動，運用近年新出版史料指出，蔣氏三連任實有其心理轉折，該轉折又涉及他對陳誠接班問題態度、陳誠蔣經國之爭等因素考量。三連任問題在歷史上同時呈現出1960年代臺灣戒嚴體制、威權統治與憲政運作之間的矛盾，以及胡適、雷震等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當時為追求民主理想實現而面臨之艱辛處境。評論人劉維開指出，政治人物不同的崛起過程，影響其對總統府軍事會談的理解及運用。國民大會在當時作為選舉總統的機構，其間成員組織的複雜度，則是探究三連任問題時另一可著手關注的面向。在新開放史料中，《張羣日記》也於此有所補充。

經過一天緊湊的會議，與會學者透過現有史料探討1960年代臺灣的相關面向，決策者及行政團隊在其中的思路與回應，期望呈現史實背後的光與影，讓此一新興研究領域能更受到關注，有更多人投入相關研究，以期出現更為豐碩的研究成果。會議當日論文經過修訂、學術審查後將編輯為專書出版，以饗學界。